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四期 ——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3b)

【往事非烟】	我在文革之初	周志兴
【不堪回首】	关于文革的一次口述史访谈	千山暮
【史海钩沉】	王力、关锋的垮台	卜伟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我在文革之初

• 周志兴 •

这要从我上初中说起。

1965年9月1日，我到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报到，算是成了一个初中生。

是我大姐送我去的，那时，她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了，和北外隔一条小马路。我当时的班主任叫吴明亮，刚刚从北外毕业不久，两个人说起两个学校的一些趣事，那条小马路似乎算不得什么，却把我扔在一边。报到完了回家，在北京的古城墙边上，就是前门到和平门之间，等无轨电车回家，我调皮地沿着城墙的砖缝往上爬，被姐姐喝止了。这个细节，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艰难地爬行。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

北外附校，当时在北京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学校。直属外交部管，很多外交部的干部子弟都在这所学校，如陈毅的女儿，王炳南的儿子，韩念龙的儿子 and 女儿。也有很多其他名人的孩子，如京剧名伶张君秋的女儿，作家叶君健的儿子，上将钟期光的儿子，等等。外附招生也特殊，在统考之前提前考试，提前录取。具体做法是北京每个小学发一到两张报名表，由小学先筛选够格去考试的学生，再从这上千个学生中笔试面试选出160人，分成英、俄、西、法四个班，每班四十人，30个男生，10个女生。

我的小学是二机部九院的九一小学，得到了一张报名表，给了我，我碰巧考上了。

介绍这个学校的背景，是为了说明，就是这样一个尖子学生扎堆的学校，文革中也是血雨腥风。

现在想起来，1966年春天的风，似乎就带着一点怪味。记得四月份某日的北京日报，发了一整版的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我那时候小，不懂，但是，感觉大人们看报纸时，脸上都挂着霜。现在想，他们对1957年的那场运动还记忆犹新呢！

外附的运动正式开始大概是五月份，隐隐记得是5月23日，是个晚上，临时拉了灯在学校办公楼前的小操场上，这个小操场，有几棵种在我脑子里的大树，两棵挺拔的银杏，一棵长满了皱纹的槐树。全校师生一起听传达。那时，全校都是住校生，哪怕家就在校门口也不准回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似乎是传达516通知，也许不是，确实太久远了，那时又懵懵懂懂的。当时传达的是校长李涛和书记齐平。

李涛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年纪虽然不老但是已经谢顶，脑门很大，因为灯光下，似乎渗出细细的汗珠。他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了许多斗，并且被送了一个外号：小白猪。

这个会很严肃，有些话是杀气腾腾的。我似懂非懂，只是知道，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

不到十四岁的孩子，停课闹革命，懂什么是革命吗？

我们学校这个院子，在北京和平门外，是原北平师范学院的院子，老建筑还都保留着，院子里有石碑，碑上刻着老师们的名字，周树人的名字也赫然在目。那个时候，这些并不吸引我，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一是玩，那时迷上了篮球。学校的球场是砖铺地，砖头已经被磨得坑坑洼洼，晚上照明的只有路灯，这并不影响我天天在这里奔跑跳跃，晚上也在昏暗的路灯下投篮。当然，我在小学就打篮球，进了外附就是校篮球队成员。这么勤学苦练，技术大有长进，后来到了部队，成了一个专业篮球运动员，不过总是坐板凳而已，其实，不是我不棒，是我的队友们太棒了！当年在这个篮球队打球的，有后来进了国家队的吴昕水、马连民、穆铁柱、邢伟宁、叶鹏、张斌、胡建国，等等。

利用不上课的工夫，我又学会了打排球。记得排球场就在办公楼前，两棵树间拉一个网子，依然是青砖地，依然是坑坑洼洼，居然也没记得崴过脚。那时初三西语班有个男生叫高林俊，文革中改名叫高风，是一员骁将，我的排球就是在他的感召下学会的，当兵后，离开篮球队后，我还打了一段时间排球，代表军区直属队参加济南军区运动会，得了一块银牌。不过，去依然坐板凳，因为我的队友们依然很强大，有国家队的，有八一队的，还有山东队的。

2003年，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高风和他的太太，也是校友，请我吃饭，说起当年的排球场，他居然不记得我了。真是让我伤感！

除了玩就是吃。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不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多少粮票了，只是记得总不够吃。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还可以买一点机动粮，用机动粮买大锅煮饭的锅巴吃，一咬嘎嘎响，啧啧香，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再就是烤馒头。那时教室没有暖气，生炉子，把馒头放在炉子边上，一会儿，带着些许焦味的粮食香气就弥漫开来。

又想起那句话，少年不识愁滋味，真的是这样。

为了吃，无聊的时候，几个同学晚上还到街上去打野猫回到宿舍用电炉子煮着吃，我那时是个乖孩子，不敢，又不能显出害怕，都是跟在后面。想起来，那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暴戾为勇敢的。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学校进驻了工作组。

我们学校是外交部管的，工作组也是外交部派来的。现在还记得，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工作组长是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附校的工作组负责人我倒是忘记了名字，派在我们班的是个年轻男子，白白净净的，同学们很快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小白脸”。

我们这个班是初一英语班，有不少外交部干部的孩子，像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的女儿，驻埃及大使黄华的女儿等等，最开始的时候，外交部的干部子弟和工作组的关系非常好，可以理解，这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工作组员的领导。但是，几乎是一夜之间，事情180度大变化，外交部的子弟们反戈一击，顿时对工作组不那么亲密了，甚至恶言相向了。

那时候，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从浙江返回北京，要亲自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是为了压制群众运动，所以，工作组灰溜溜地走了。

刘少奇也是灰溜溜地靠边了。

这只是一个序幕。

工作组走了，同学们开始了自我管理自己的阶段。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66年的八月十八号。

天还没亮，我们就步行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在和平时门外，离天安门不远。穿过杨梅斜街，大栅栏，到天安门广场时，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好在是夏天，不冷，但是，在广场上一呆三四个钟头，问题在于上不了厕所，只得憋着。说起来，这事情我还有惨痛教训。

毛主席当年八次检阅红卫兵，有一次是坐车，红卫兵们站在马路两旁等候，这次倒是有厕所可以上了，但是还是要憋着，怕尿尿的时候，毛主席的车队过去了。可是，我自制力不够高，实在憋不住了，还是跑了趟茅房，结果就是那么寸，毛主席的车队就在这会儿过去了。我懊悔

了很久。

其实，对于八一八，我只是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后来有一首歌，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词：“永世难忘八一八啊！”曲调婉转，十分好记。可是，实在是离天安门广场太远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几个绿色的小点在城楼上移动，我们就向着这些绿色小点欢呼跳跃。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证明，有人回忆说，当时跳跃的红卫兵们在广场上丢下了不少金条，都是他们抄家的战利品。我可是一块也没看见。其实，那时候的人相对单纯，我不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见财起意，但是，确实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抄家这事情我做过的，不过因为小，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印象里就是院子里都是些所谓的四旧，字画、照片、家具，再有，就是哀怨的眼神。抹不去的记忆里，是和平门外学校旁边有一个沙土园胡同，我跟着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孩子去抄家，一个老太太因为要保护被抄走的财产，被打了，昏倒在地上，我奉命端了一盆冷水浇在那个老太太头上。要说坏事，这是我唯一做过的一件。

忘了过多久，似乎一年？是我们串联回来，北京有一段时间落实政策，返还那些被抄的东西，我又到了那个老太太家，她居然一下子认出了我，说，我记得你，你来过！

我真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如火如荼。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起，占领了宣武门的天主教堂，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学生们胆子也越来越大，动作也越来越猛。

八月份里，校园里死了三个人。两个是老师，都姓张，张辅仁和张福臻。

关于张辅仁，有文章这样记载：

“张辅仁同志，天津人，”文革“开始时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为人忠厚老实，教学效果很好，说一口流利清楚的标准普通话，但比较内向。写一手漂亮的字，却从不以此炫耀。据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曾积极参加鸣放，虽未划为右派，也算是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吸取教训，多做事少说话，任何思想问题，无论大小，都向组织汇报，且以书面汇报居多。反右到文革，十年下来，档案里的汇报（包括检查）材料一定会集成一大本。他本以为多汇报可以赢得组织的了解、信任和帮助，想不到反而成了索命的神符，成了“漏网右派”的铁证。1959年附中刚成立，他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即后来称为红五类）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当年，解放区土改时贫雇农把土改工作组当作亲人和革命的领路人，向恶霸地主作坚决的斗争；同样，今天红五类的学生们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向迫害、摧残革命学生的一贯对党不满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分子”们）清算另一笔血泪账了。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张辅仁同志被本班学生揪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打死两个老师这件事情，我记忆深刻，听说，练刺杀用的木枪打断了好几根，还有学生到这两个老师家去，要他们赔木枪钱。以至于现在一听到腥风血雨这四个字，我脑海里的图案就是那天早晨，校园里一片肃杀，那张“杀二儆二百”的布告似乎在滴着血。

除了老师被打死，更多的老师是被侮辱，被迫害，也有因为受不了而自杀的。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叫于韵秋，上学时，和我们关系非常好，文革起来时，也挨整了，据说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事例之一现在听起来啼笑皆非，有一次在课堂上，于老师坐在后排，前面讲台上是外教汉德，汉德问于老师，昨天你干什么去了？于老师说，打针。汉德又问，是打胳膊吗？于老师答，不是，是屁股。

就这一个回答，也作为作风不好的事例。

刚才说到三个死者中，另外一个据说是住在附近胡同里的地主，抄他家时，他不配合，就被抓到学校的防空洞里关着，不知怎么死了。我只是看到尸体被抬出去的场景。

1966年的八月，真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月。

2013年五月，我到哈佛大学有个演讲，现场翻译的小姑娘说，希望有时间和我单独谈谈。我见了她，她是研究文革的，她说了一个观点，就是文革中为什么这样的暴力盛行，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教科书都在描绘和歌颂战争时期的暴力。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不无道理。

文革之火在燃烧了，风又起来了，火借风势迅速蔓延开来，十三四岁的孩子也没有幸免，如果真的有一台录像机在的话，那一段时间记录的故事，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剧。

不过，把历史这台录像机的带子倒回去，需要不少的时间。

1965年底或者1966年初，老师领了一个同学到教室，告诉我们，班里新来了一个同学，叫李美勤，来自哈尔滨。

李美勤个子不高，圆脸短发，显得比较成熟。后来知道，她比班上同学都要大一些。

这是我们班里的第二个插班生。

第一个是程琳，她是程思远的女儿，这一年，李宗仁从美国返回大陆是个轰动消息，而李代总统的秘书程思远的女儿程琳到我们学校读书，是那块石头扔进池塘那涟漪的小小一圈。

李美勤也是另外一个涟漪的小小一圈。

1965年10月，刘少奇和王光美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访问了哈尔滨，特别安排了参观儿童火车站。细心的刘少奇还特意把“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站牌改成“北京开往金边”。李美勤就是这个儿童火车站的站长，她也刚刚上初一。

据说，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说了不少赞扬的话。怎么把国家主席的喜欢落实到行动上呢？不知走了什么样的程序，李美勤就到了北京，进了我们学校。

我们这所学校，全称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当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校，主要是培养外交官。学制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一条龙，归外交部管，提前招生，北京每个小学发一两张报名表，由小学推荐优秀的学生考试，从中选出160个人，分为英俄西法四个语种四个班，每个班30个男生10个女生。全部寄宿，而且有外教，有当时最先进的电教室。

插班到这里，还是要有点路子的。

李美勤来了就当上了干部。也可以理解，有刘主席的关系，她本人也很优秀，也比较成熟。不过，我真的忘记她是什么官衔，这次见面问了她本人才知道，是文娱委员。不过，我不记得她有什么文艺细胞了，只是记得她的组织能力很强。如果外附是个火车站，我们初一英是一列火车，她不是列车长，倒是依然像个火车站站长。因为，基本上全校的人都知道我们班里来了一个名人。

我和李美勤的交往极少。只是偶尔会听到一些传闻，说她星期天会到国际俱乐部，有时还会见到王光美。传闻而已，到现在也不知道真假。当然，她孤身一人在北京，星期天总还是要找些去处。

1966年是一个风波骤起的年头。

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是五月份开始席卷平静的校园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被这阵风吹得东飘西晃的，没学可上。

六月的一天，记得正好是交伙食费的时候，突然听说，李美勤家里有了病人，急需一种中药，叫“金匱肾气丸”。基本上全班同学都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捐出了伙食费。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很多人骑着车，到处去找药。

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单纯，谁都把别人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李美勤是不是流了眼泪。但是，她一定是铭记一生的。她是带着药，还带着同学们的情义坐上回家的火车的。

这阵骤起的风在不断地变化着方向。

李美勤回哈尔滨之后，情况突然天翻地覆。红卫兵成立了，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海洋般涌动的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对联也开始流传开来。这时，同学们突然发现，李美勤原来出身不好，原来，大家帮助了一个“狗崽子”，况且，是和刘少奇有着说不清关系的“狗崽子”。

所谓出身不好，是说她的父亲是小业主，具体说，是个裁缝，个体户。

这下，故事走向了反面。像是一个浑身光环的人突然断电了。

八月份，李美勤从哈尔滨回来，迎接她的，不再是热情的言语和亲切的目光，而是冷言冷语，白眼相加，甚至是辱骂和威胁。

从如沐春风到跌入冰窖，只有短短几十天，个中滋味，恐怕她也要铭记一生。

后来，同学们大都和李美勤不再来往，我记得，只是在1968年底，她和西语班的一个女生娄平在晚上找我，问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情，那时，我是学校革委会的委员，她以为我会有些信息。那天说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那个夜晚，那双眼睛的那种迷茫，却是我难以忘记的。

不久后，我离开学校去了部队，李美勤的消息都是断断续续听说的，知道她去了迁安铁矿，在那里当了播音员，后来有机会上大学到了北大法律系，又留校当了老师，嫁给了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战斗大队的头头，再就是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说来有趣，一个文革中的失意者，最后和文革中的播火者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殊途同归吧！

相信李美勤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少很深的脚印，起码，按照时间判断，她在北大法律系执教时，很多重要人物是在这里读书的，包括今天的总理。

在命运中沉沉浮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遭遇。

其实不只是李美勤，很多同学在运动中受了伤。记得初二西语班有个同学叶念伦，他父亲是叶君健，不知怎么，就说他想成立一个叫“中西拉邦”的组织，明显是要里通外国啊，于是，他也被斗得灵魂出窍。

想起了叶念伦，就在百度上查一下这位老校友，看到人物词条是这样说的：

“叶念伦，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之子。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传动专业，1978年又考入北京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1980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叶念伦作为国家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奔赴英国约克大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在中国军工厂工作六年，后以自然归化加入英国国籍。1990年，因工作需要，回到国内发展，叶念伦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公司。

叶先生从事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近三十年，为此在英国创办可从事出版业务的艾伯尔有限公司，在中国投资创办英国独资北京君健语言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其间曾任德国、英国、荷兰等公司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独资公司总经理、大中华地区总代表等职位多年，首次引进中国英式管家培训。业余除翻译过大量科技资料外，叶先生还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内容侧重中西方文化碰撞，被称为海外华文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叶念伦先生是英国华文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并任秘书长，曾被选为英国作家笔会通讯会员。代表作有《天球篇》。”

不知道叶先生是否记得这段历史。侥幸的是，他没有被折断了翅膀，依旧飞了起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气。

还是回到李美勤。

这次再见李美勤，是我约她在杉园见面，她和夫君同来。她个子还是不高，脸还是圆圆的，不同的是胖了，显得有些臃肿。岁月这把刀，没有饶过她。

只有眼没变，嘴没有变。眼睛还是清澈的，话语还是简洁明快的。

我们是在阳光房里聊天，秋光里，树叶泛黄，不时的落下来，又被风吹动着拥挤到一个角落。这是肥料，会滋养其他的植物，下一个春天，这些落叶的生命会在那些嫩芽中复活。

我们也到了秋天，或许，也是秋天的那一片树叶。

说起秋天，不能忘记1966年的秋天。

那时候，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早已经成立了，大都是干部子弟，他们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背着军用挎包，骑着自行车，威风凛凛。记得最响亮的话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是毛泽东年轻时候的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每个人都豪情万丈。

我没有进入红卫兵的队伍，一是我出身是工人，那时，比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要低一个档次，又没有革命这项帽子，差别很大，谁也没听说过革命工人不是？再就是我那时还是个十分腼腆内向的人，不怎么说话。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同学是程思远的女儿，同学几年，我只和她说过一句话，那次，她打扫卫生打坏了我的一个砚台，她说：我赔你吧？我说：不用了。如此而已。

后来，一批没有被红卫兵接纳的出身又马马虎虎过得去的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是“思想兵”，我参加了这个组织，但是也是跟着混的。这个思想兵，似乎级别上比红卫兵低一点，但是又高过后来一个组织叫“红旗”，这似乎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

不过，这些组织最红火的时候，还是在八月份，八月以后，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就奔赴祖国各地了。

第一次串联是在八月底，大规模串联还没有开始。所谓大规模串联，是说火车开了专列，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行动起来了。

我和一些初二的学生一起，第一站到了西安，在西安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的大标语满街，写的是打到刘澜涛和霍士，这两位，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的两位负责人。

从西安一下子杀到了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的，那时的火车慢啊，似乎坐了两两天两夜。因为大串联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坐的是旅客列车的硬座车厢，和旅客们坐在一起。那时候兴学雷锋，我还提着个大水壶，不断地为旅客们倒水。尽管不断走动，但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下车时，发现脚肿了。

在乌鲁木齐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吃羊肉。那时的新疆很富庶，我们住在八一农学院，牛奶随便喝，羊肉随便吃。结果吃坏了肚子，一晚上总跑厕所。后遗症是我现在不吃羊肉。二是我们被新疆人围在八一广场，因为我们要炮轰王恩茂。

当时，“炮轰某某”是常见的口号，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先炮轰一下再说。当时的解释是，炮，是毛泽东思想，轰，是衡量，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好人。其实，谁也经不起这样的炮轰。

王恩茂是新疆的最高领导，当年在著名的359旅，他和王震曾经是多年的战友，王震调离新疆后，王恩茂管理新疆很多年。没想到他在新疆威望很高，当我们喊出炮轰王恩茂的口号后，很多乌鲁木齐的市民不干了，他们围着我们和我们辩论，说，我们看你们不是北京来的红

卫兵，你们是台湾来的特务。他们还有一个说法，王恩茂是新疆八百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这群北京来的孩子，哪里知道王恩茂到底怎样，反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出声保的人，我们都敢碰。没想到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2007年，为了撰写王震百周年的纪录片，我又到了乌鲁木齐，时隔四十年，这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我说的变化，还不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能够感受到的内心的东西，脸上的笑容，民族的和谐，领导人的威望，这些，似乎被一场刮了四十年的风一点一点刮走了。

1966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11月，我都在忙于串联。开始还说是播文革之火，后来就纯粹为了玩了。当时我的原则是去远处，今后不太方便去的，除了乌鲁木齐以外，还去了广州、锦州等地。

大规模串联开始以后，开了很多红卫兵专列，因为人多，车厢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连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我常用的一个办法是钻到三人座椅的下面睡觉，幸亏那时我的体积没有现在这么大，不然，钻也钻不进去。

大串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步行，也就是那时所说的“长征”。

文革初期，其实就是个深度洗脑的过程，共产党的一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一切，都要深深植入孩子们的脑袋。毛泽东的每段语录，都像雨露，要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比如说：长征是播种机。

为着这句话，好多孩子行走在路上。

我们第一次选的目的地很近，是天津。但是，走到通州，就走不动了。关键是军心瓦解了。怎么办呢？就近拦车。有个同学叫陈志刚，外号小瘸，其实他不瘸，但是也不刚，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学他拦车的那句话：我们走不动了，帮帮我们吧！结果是没有成果，车都是呼啸而过，也许因为我们人太多了，谁也不停。于是，不知道谁说，附近有火车站，坐火车吧。坚持走到火车站，看见一列客车静静地躺在铁轨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管他开到哪里！

结果，火车把我们拉到了锦州。

那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

第二次长征，到了1966年的11月间。当时，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停止大串联，也就是说，免费的火车，免费的住宿都没了。我们几个同学不甘心就这样停止了如此美好的生活，商量着钻个空子，不是没有免费火车吗，我们长征。

这次选的是从西安到延安，大约一共760华里。我们六个同伴，都是14岁，每人只背一个书包就上路了。记得第一站住在三原，后来学了历史才知道，这是冯玉祥三原誓师的地方，而邓小平留学归来，第一份工作也应当和这里有渊源。

我们没有看到历史，却是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在三原我们多呆了半天，为农民拔了半天的萝卜。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居然还收到了农民寄来的感谢信。

我们当然也不是光做好事，也做坏事。在快到延安时，我们在户县住了一晚，那时已经很冷了，我们几个躺在炕上，实在扛不住了，决定点火烧炕。当地农民应该是很少这么早就烧炕取暖，就是取暖也是在灶上烧饭同时取暖。我们情急之下，在老乡门后拿起一些白色的秸秆就塞在炕洞里，点着了火。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麻杆，应当是农民还没有剥过的。

不过，当地农民很淳朴，他们给我们开了窑洞的门，很放心，再也没来巡视过，我们一早起来，迅速出发了。

路过黄陵时，我们还和当地的有关领导见过，为什么见，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一点，这儿有狼。

当天，我们恰好又迷路了，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预定要住的那个村子。那是个叫后河南的村子。

黄土高坡上，过一个沟壑就是一马平川，只有再下一个沟壑，才想起刚才其实是在山上。那个晚上，月亮冷凄凄挂在天上，我们走在类似深沟的一条小路上，路边高坡上草已经枯黄，夜风吹得这些草沙沙响，在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有些瘆人。忽然，扑棱棱一阵响动，吓得我们浑身鸡皮疙瘩，原来，是我们的脚步惊动了一只山鸡。

我们提心吊胆地前行，像那只惊恐的山鸡。

这当口，后面匆匆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们去哪里，自告奋勇带路。我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好紧，生怕这是个地主分子，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加害，于是，我手里抓了一块石头，走在最后面，眼睛盯着这个带路人。

说实话，在黄土高坡上找到一块有杀伤力的石头，难度还挺大。不过，还是白找了，我们看到了村庄，闻到了炊烟的香气，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这一路，还是经历了不少故事，760里路，我们六个14岁的孩子，徒步走了九天半，不能不说是一种锻炼，我们曾经饥一顿饱一顿，曾经睡在草堆里，在一个叫甘泉的地方，我们六个人盖了一床被子。

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场景，回到北京，我回到家里，妈妈还没起床，躺在床上心疼地看我浑身不得劲，问我，是不是长虱子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一轱辘爬起来，说，快把衣服全脱下来，扔到阳台上去。

果真长了一身虱子。后来，身上还长了疖子，化了脓。到学校医务室去看大夫，大夫直摇头。给我挤疖子时我还是很坚强的，大夫的称赞现在还记得：这孩子真勇敢，长大能当解放军。

其实还用长大吗，两年后，我就穿上了军装。

在延安的事情可以忽略，无非是看宝塔山，喝延河水，瞻仰枣园，每个去延安的红卫兵都是这些节目。从延安回来是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铜川上火车，这也是中央觉得再不这样的话，学生们野掉的心很难收回了，于是用各种办法把学生找回去。

这是是1966年的11月中旬了，陕北已经冷了。我还是光脚穿一双布鞋，就是当时北

京小孩喜欢的白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那种懒汉鞋，一身单衣。车到洛川，大家下车上厕所，我的鞋掉了，光着脚在地上走，我居然没有感觉，原来是冻僵了。

三十年后，1996年底，我作为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的组委会秘书长和现场总指挥，又若干次走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那些地名，三原、黄陵、甘泉、富县，听着都是那么亲切。

每一条路，都不是白走的，这就是长征给我的启示。

串联结束回到校园。校园大变了，是气氛和味道的变化。红卫兵不那么重要了，虽说绿军装和红袖章仍然是不少少男少女的标配，但是含金量少了许多；老师们见到学生再也没有师道尊严，多了些唯唯诺诺和谄媚的笑容；虽说要准备“复课闹革命”了，但是没有人再想学习的事情。有的人忙于在外面“拍婆子”，所谓“拍婆子”，就是在街上找女孩搭讪，排解一下青春期荷尔蒙的过剩；还有的人就钻窗户进到学校大门口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我们校园里，但是不属于我们学校，里面很多藏书，胆子大的就偷出来一些，我是胆小的，尽管也告诉自己，偷书不算偷，但是还是不敢钻进那扇破窗户。

我那时14岁，胆子不大，有点内向，因此也不合群。有这样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佐证。

那时候，学校里还是有派性，老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等等，班上也分成若干团伙，虽然还没有大打出手，却也是彼此不说话，不往来。我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独立寒秋”战斗队，就是一个人的组织，“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毛泽东的这首词，现在我还背的滚瓜烂熟。不过，我这个战斗队什么战斗没打过，在教室里贴了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很快寿终正寝了。

现在，大概很少有人说我是内向了，也不会认为我胆子小，尽管我自己还是这样认为。我后来若干次想，我为什么会变化了呢？其实，人生道路上，很多偶然的事情会改变轨迹，很多明明是向东走的事情，不知不觉会走到西面。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在浑浑噩噩中，学校迎来了一批新的管理者，叫做“工军宣队”，这是中央的新举措，是一条缰绳，为了拴住这些野了心的小马驹。

工人来自北京第二机床厂，负责我们班的工人师傅叫海明玉，是个个头不高但很粗壮的汉子。外附和这座工厂还很有渊源，后来，学校很多学生分配就去了这家工厂当工人，包括我的好朋友高占生，2011年我去美国，还去旧金山总领事馆去看过他，那时他是驻旧金山总领事。直到现在，似乎还有人坚持在这家工厂。

军人来自总参通讯兵，负责我们班的是个军官叫丁焕忠，常州人，我的小老乡，那时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岁，瘦瘦的，我们给他一个外号叫大烟鬼，事实上，他的烟抽的也很凶。这位军人别看瘦，很有力气，那时很多男生和他掰手腕，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而且是一败涂地，没有挣扎的份儿。可是他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有一次，他被班里同学捆起来塞到了床底下。因为有的同学父亲是军人，职位比丁焕忠这样的小排长高得多，所以不把他看在眼里，于是就弄了这么一出。

工军宣队来了以后，学校逐渐正规起来，和全国一样，学校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时这种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成员由被解放的校领导、教教职工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在派性还很厉害的时候，要选两名学生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还是有一番斗争的，每一个派别都愿意选择自己人，而另一派的人就会拼命反对，这种情况下，中间派或者派别面

目不显著的人就容易被选中。

结果，我被选上了。

有一点意思的是，当时我们班里班主任吴明亮是常州人，军宣队的丁焕忠是常州人，我也是常州人，班里三个领导，是常州人的天下。

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成员，尽管幼稚如我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标签却插上了。两年后，我参军到了部队，这个标签使得部队对我另眼相看，给了我我很多荣誉和机会，而因为这些轻易得来的荣誉和机会，又换来了老兵们的另一种另眼相看，在入团、入党、提干诸方面给我制造障碍，让我摔了不少跟头。这是后话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文字，是因为现在小说、电影电视有不少描写文革的作品，很多是惊心动魄的，也有很多是离奇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只是用我的记忆写下我在文革之初大约一年时间的的生活，不能代表别人，只代表我自己。

也许别人经历了惊涛骇浪，我，就是一滴水。

附：李巍先生的勘误来信

志兴：你好！

你的《我在文革之初》有几处记误，（1）高林俊后改名高峰，是初二俄的；（2）初三西的宋江后来改名为宋风，从“2003年，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高风和他的太太，也是校友”看，是宋风；（3）5·16当时是传达到县团级，我们听不到，公开发表是在1967年5月16日；（4）叶念伦是初三西的；（5）李美勤是在北大英语系学习（1974年丹麦首相哈特林访华，参观北大，有李美勤的电视镜头），法律是后来旁听的（？）。

另：附校的工作组负责人名叫吴化远，山东人，70年代任瑞士使馆临时代办。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齐怀远也是工作组成员，在我的下铺住过几天。负责咱们班的工作组成员叫徐惠林，有较浓重的口音，应该是南方人。

祝新春愉快！

李巍

□ 原载《共识网》2014-01-07

~~~~~

【不堪回首】

关于文革的一次口述史访谈

• 千山暮 •

A：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您的年龄和身份是怎样的？

B：我那个时候是十九岁，正好高中毕业了。红卫兵当中在中学里面年纪最大的那一届，或者说是红卫兵的主体，我就属于这一届。

A：文革刚爆发的时候，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B: 我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右派份子，57年打成右派的，所以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坏右”里边右派份子的子弟。所以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整个的家庭，包括我本人，我们的亲属朋友，几乎都是陷于一种恐怖当中。

A: 您说到恐怖，是否也有文革爆发前的经历的影响，能不能谈一谈？

B: 那当然，因为1958年5月18号，我的父亲就和安徽省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在一个夜晚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当我知道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来到学校里，那个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我们一个班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几乎有十多个同学的父亲或母亲被逮捕。从那一天开始，这种恐怖在我们的心理里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校方，老师，和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指骂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们到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回来就要被变相地批判，斗争，所以，这样的阴影在我的心理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1960年之后，1962年抓阶级斗争，虽然我的父亲已经被放出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属于五类份子的家属，被监督劳动的家庭，我的父亲每天早上必须在街道委员会的监督下扫大街，就这样，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份子的命运还是最好的，因为他没有被弄死。我们还没有家破人亡，因为我的哥哥姐姐能够寄一点钱，养活我和我的小哥哥，还有我的父母，所以我们没有讨饭，没有从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生活。这样的恐怖，其实从1949年以后，就深深地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除了那些所谓的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解放者们。

A: 是什么人在控制社区和城市的政治生活呢？

B: 党。党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四千万党员。这些党员当中的掌权者们，从中央到地方，到每一处农村，到每一个小学校，所有中国领土所能达到的地方，都由他们统治，都由他们说了算。在57年的反右派的运动中，只要一个普通人，说了一个党员的坏话，向一个党员提了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份子，就会被劳教劳改，家破人亡。而这个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一个49年以后，所谓的掌握了政权的人，打了江山的人，他们从上到下，分到全国各地，当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另外一种就是靠分化人民制造的，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当成统治阶级，当然是虚伪的，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用成分好的，工人农民，无产阶级，党的干部，干部的子弟，这样一些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产党打倒的，知识份子，所谓在旧社会有劣迹的，国民党，军警，家属，工作人员的后代，都是被打击，被压迫，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在中国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一小部分跟党有权力关系的，被党认为是出身好的人统治着整个中国，另一部分被党统治的人在呻吟着。这种状况已经维持了十七年，同时由于特别的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倡共产党的人，斗争那些所谓成分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有现行问题的人。它就造成一种人民之间的仇恨，通过电影，艺术，文学，绘画，进行了十七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共产党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用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把整个国家统治在一种极其恐怖，阴暗的状况中。所以大家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为什么文质彬彬的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会抡起皮鞭去打自己的老师，用自己的皮带，活生生地抽死老人，小孩，妇女，其实很简单，十七年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制造阶级斗争的教育，已经培养了仇恨。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被发动起来的。

A: 文革的爆发是否给您这样出身不好的人也带来一种转机 and 希望？

B: 不可能。文革爆发前的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动了十几次政治运动，已经杀害了将近六千万中国人民。因此，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运动又被发动起来了，又有一批人要被处决，

被劳改，被劳教，被践踏，自杀。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这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杀了。这就是他当时说的话。

A：你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个人的印象和感受是怎么样的？

B：那个时候，你要问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感受，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领袖，当作人民的救星。教科书是这么说的，社会上这么说，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地方，从最有脑袋的知识份子，到没有知识的农民，他都会这样来回答你。而且绝大多数人也会这样认为，就是这样认为的。以我对自己当时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确实有很多人对他是有很深入的看法的，但是，没有人敢说。第一，不敢深想，第二，想了也不敢去讲，第三，一种恐惧的心态，使他们强迫自己认为自己所想的是反动的，是不正确的，起码是要倒霉的，要坐牢的。

A：能描述一下运动初期您的个人经历吗？

B：1966年我高中毕业，7月1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成绩，在安徽芜湖第一中学是最好的。安徽芜湖第一中学是安徽的第一所中学，是全国重点中学。可我知道我是考不取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五类分子的儿子是绝对不允许考得上的，无数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我毕竟是年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还是努力学习，准备考试。1966年6月18号晚上12点刚过，住在我对街的一个同班同学，深夜敲响了我的门，因为他家有收音机，我的家没有。敲响门以后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做题目，我说还有十二天就考试了，我说我在做题目，他说，不要做了，高考制取消了，我们考不成大学了。原定7月1号举行的高考，因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宣布推迟半年。7月1号就没有考了，全国的高中生没有考大学，不到两个月，高考制被取消，这一取消就取消了十年，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我们这一批1966年的高中生，是在1977年，也就是11年以后，才参加考试的。这个时候，运动开始了，红卫兵建立了，到处抄家打人。象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为我成分不好，不准革命。你没有资格去参加他们的红卫兵组织，那你是什么成分呢？你只能充当被抄家的人，我只能跟着班上成分好的人，去别人家里抄家。我永远在最后面，文革以前，我们班39个人中，有两个成分不好的，文革以后，我们班有30个出身不好的，只有9个出身好的，于是，这9个人就统治了我们30个人，我们30个人只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抄家。跟着他们抄别人的家，带着他们抄自己的家。反反复复地抄着，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斗同学的父亲母亲，让自己的父亲母亲去被斗争。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在中国古代都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了，他还要跟着别人去干这样一来的事情，带着别人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想想那个社会是怎样的样子？那个社会，表面上极其高昂，天天是喊口号，刷标语，红海洋，要革命，可是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多少人为自己的父母被打死斗死难过，可是不敢说出来，不敢哭出来。父亲母亲被打死，被斗死了，还要参加斗争自己父母尸体的斗争会。如果你表现出悲哀，你流了眼泪，那就轮到斗你了。我的同学当中，有给父亲贴大字报的，有揭发父亲反共反动的，有给母亲贴大字报，逼得母亲跳楼自杀的。

我当时作为一个五类份子的儿子，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就是成天心惊胆战。我在同学中是成分不好，成绩好的，被老师认为是很有才华的，吹拉弹唱，写书法，我样样都能搞得很好，可是这个时候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封资修的接班人。我紧张地等待着哪一天大字报会贴出来，终于有一天，在八月初，我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我跟我的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第二，说过，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也会是右派，我真的说过。就这两条，如果没有8月16号，毛泽东为了利用学生帮他造反，发布十六条，短暂地禁止学生斗学生，我这条命大概不会活到今天。所以直到8月31号，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跟着我们班同学，走路去看毛主席。从我们住的安徽芜湖市到北京是两千多里路，我们走过了长江，我们快走到淮河，扒上火车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

这个故事我就要告诉你，说明一个问题，在整个广场上，在几百万学生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就是恐惧两个字。当然有很多学生怀着无比的真诚，无比的崇拜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因为恐怖而高喊万岁的人，因为痛苦害怕而高喊万岁的人，心里埋藏着仇恨却要求自己高喊万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不能说，因为她在国内，我和她一起坐在天安门广场升五星红旗的旗台下面，五十万红卫兵全部坐在那儿，等着毛主席，贺龙，林彪坐的吉普车过来。车开过来了，我们欢呼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是不得不喊，我跟着喊，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喊，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喊。可是我身边的这个女同学，她也举手喊毛主席万岁，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我耳边偷偷说了一句话：今天没有枪，有枪我就打死他！这个女同学今天还在国内，三十年来，我在我的内心里，一直对她是最尊敬的。在我心里，那么年轻，我当时就把她看成敢于刺杀列宁的社会党人卡普兰。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当她在我的耳边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回过头来死死地瞪了她一眼，我知道，如果这句话被讲出去，被别人听到，就会被踩死在五星红旗下，用不着逮捕了。

刚刚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被班上的红卫兵召集在一起，说北京讲了，任何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到北京，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离开北京。我们班上两个成分特别好的，共产党子弟，就把我们这三十多个人赶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火车站的广场上面，全部是一片花头啊。男的，头发被剃光，女的，被剃成阴阳头，脸上冒血的，身上冒血的，到处都有，孩子被打得，吓得惊慌直叫的，满广场都是。红卫兵们，北京的高干子弟们，穿着军装，带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皮鞭，可以在他们身上任意地抽来抽去。后来知道，这一批人的总数有四千，干什么呢？把他们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北京是不能容许四类份子生存的。你想，我是什么心情？我是从小爱好文学的人，多多少少受了家庭的影响，和我自己读了很多书，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多少了解一点。我看到这种情况，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种厌恶。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厌恶感。我这种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不是很多的，就是明确地晓得厌恶这种东西。

当我们这三十多个人走进北京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北京的红卫兵们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北京车站的大厅里面。当我们刚刚走进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很老的老太太，我现在记忆犹新，她穿着褐色香云纱的衣服，一对红卫兵走到她面前停下来，问她，你是来干什么的？她说，我是来看儿子的。一个女红卫兵问她，你从哪里来？我是香港来的。你的儿子干什么的？我的儿子是某某部的什么局长，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说，他早都被我们打倒了，然后就举起皮鞭，一鞭子从头到脚抽下去，老太太的血从脸上怦地喷出来，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谁也不敢去救，谁都要跟着这些红卫兵喊，老子反动儿混蛋，喊毛主席万岁，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你说，这叫不叫恐怖？

那天，从北京上车以后，我就挤在卫生间里面，站了十八个小时，第二天开到蚌埠，转了车，过了江，到了家。我告诉我父亲，我说，爸爸，你说你解放前当校长，做教授的时候，对家乡人很好，你帮助过三十多个家乡的老百姓，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说，你一定要跟你儿子说老实话。他说，我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救过很多人。我还救过很多共产党。我说那好，你听我一句话，我说北京这种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了。不仅是斗争，大字报，普通的抄家，就是直接地去打死这些四类份子。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必须回老家，我们班上的红卫兵，他们把我赶回来，他们很可能跟在后面就回来了，因为他们学了北京的革命经验，回到小城市来就要大张旗鼓地这么干了。我爸爸比较镇静，妈妈就不一定了，也是大家闺秀，比较爱面子，如果把你们两个放在家门口，剪你们的花头，你可能还能忍受，妈妈可能一头撞死了，不撞死也打死了。我一点半钟到家，三点钟说服我的父母，四点钟之前赶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户口主动迁到了农村。我父亲在家乡躲过了这场浩劫。每天早上做为改造的内容，他去扫一条小街，

除此以外，乡亲们很照顾他。凌晨四点，我回到了在芜湖的家，我八岁和七岁的两个外甥女，从楼上扑下来，说，小舅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断了。我一看，整个家被砸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就抱着两个外甥女，坐在地上，睁着眼睛，湿衣服也没换，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坐到10点钟左右。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不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作为一个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一个造反队的根本原因。而且以我当时浅显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人伦的，不讲人性的革命。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我读书的十年。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这批同学当中，成分好的造反，成分不好的，由于毛主席发表了十六条，说学生不准斗学生，但已经先有一部分学生起来斗了一部分学生了。那么，这部分被斗的学生呢，也起来造反，保卫毛主席，老红卫兵呢，也起来造反，要保卫毛主席，不论是运动初期斗人的和被斗的都要做红卫兵，都要去保卫毛主席。他们互相斗就不说了，他们更重要的是去斗谁呢？还是地富反坏右，斗那些49年以后已经被斗了不知多少遍，只是还没有被斗死的人。一直到1968年，把我们这一代人全部下放到农村。因为这一批人在过去的这两年中，造反，斗争，打派仗，发展到红卫兵们都有武器。互相开机关枪，甚至连迫击炮都用上了，我的同班同学被打死了八个。到1966年，毛泽东觉得不好收拾了，提出上山下乡。按照他的号召去造反的，抓的抓，杀的杀，按照他的标准作恶不太多的，全部下放到农村。我1976年曾经到农村做过一个调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郊区的一个公社里，下放的四百多个女孩全部被本村的干部强奸过。

A：您在当时能读到的，感兴趣的是什么书呢？

B：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的那批同学，他们天天去抄家，抄图书馆，抄了人家的书，那都是封资修，他们当中，人情是永远不会绝灭的，我的那些同学们，我有时候就跟他们讲，你们有时候就不要烧，给我吧，于是，他们在抄家的过程中，只要不是被他们认为是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书，明显的封资修的书，比如莎士比亚全集，比如孔子的书。74年才批孔，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批孔。这样一些书，诗经啊，唐诗啊，我就看这些书，第二，在两派武斗已经很厉害的时候，我的搞武斗的朋友也给我送鸡蛋，他们掌管了电台，广播站，借给我录音机，因为我喜欢音乐。我这样的人，是文革中不够资格参加革命的，等到一批也曾经是被压迫的学生也去革命的时候，他们也不带我们革命。有的出身不好的人为了参加革命，不被抛弃，可以把主席像章别在肉上，用自己的鲜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我是另外一种典型，只要有机会不让我戴这个像章，我是坚决不戴。只要有机会不让我读毛主席语录，我是坚决不读，我就在家读书自修。

A：您现在回忆两派的斗争，有没有认为基层的文革与上层政治成为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B：有不同的差别，但系统是一样的，只要毛泽东在北京发一声号召，不论是哪一队红卫兵，哪一队造反队，都是要坚决紧跟照办的。他们在镇压所谓地富反坏右，镇压所谓特务叛徒走资派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任何区别。曾经不让造反的，曾经被斗争的这一部分人，确实有带着对欺辱过自己的人的报参加运动。比方说，在我的学校，有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组成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红大”，运动初期，整所有同学，另外还有一个叫“敢死团”，其中大部分是在运动初期被他们整过的。这两派就带着单位里的历史仇恨他们互斗，但是对毛泽东号召，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分歧。这一点必须认清楚。有人认为有两个文革，一个共产党的文革，一个人民文革，我曾经在一个大会上问他们，你们当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是什么，对毛泽东天天搞阶级斗争的要求做了没有，如果做了，那么，你们的文革是不包括地富反坏右这些人民之外的份子的。如果有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是谁，发动者是谁，理论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如果把毛泽东发布16条以后的造反叫做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还是毛泽东。没有人能回答我。这是笑话么，人民有权发动一场文革的话，也就没有文革了。



A: 如果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的话, 那么这个事件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B: 从文革爆发到林彪事件以前的4, 5年间, 我因为接触很多象我这种出身于有知识家庭的人, 我们在内心对毛泽东文革实际上是深恶痛绝的。尽管我们也必须站在人群中高举拳头喊毛主席万岁, 实际上我们心里明白, 这完全是倒行逆施。但是, 大部分人是没有觉醒的, 大部分人是恐惧, 害怕, 加上盲从, 那是十七年教育的结果。可是, 林彪事件却使得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 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觉醒了。全国人民通过林彪事件才发现, 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骗局。不论是他要打倒的人, 还是支持他打倒别人的人, 都被他整了。而571工程纪要所揭露出来的毛泽东是绞肉机, 是B-52轰炸机, 它作为文件发到每一个乡每一个村, 所有读这个文件的人, 表面上都讲, 毛主席英明, 回到家讲, 毛泽东不是东西。所以,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觉醒, 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 这是文革十年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尽管人们非常痛恨林彪, 他举着小红书, 站在毛泽东的后面, 那副谄媚, 丑恶的样子, 文革当中他利用手中的枪杆子, 为毛泽东维持这个浸透着鲜血的政权。可是, 他的死, 他所制造的九一三事件, 确实确实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这个党觉醒了。但是, 人们也认为主要是坏人当道, 被斗争打倒的人, 刘少奇, 朱老总, 陈毅外交部长都是好人, 其实这一批人,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 他们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中, 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但那是后来了, 当时对他们还没有觉醒, 包括我本人。周恩来死的时候, 我还流了眼泪。

毛泽东的死和周恩来的死, 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的死的那天, 是下午三点, 全国电台广播毛主席去世了。我的一个同学, 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里来, 跟我讲, 第一句话, 老毛驾崩了。我说, 死了? (他说,) 死了。我说, 怎么办, (他说) 上街看看去。正讲着, 另一个同学又来了, 我说, 好, 看看去, 到街上一看, 街上广播里正沉痛地广播着悼词, 所有大街上, 没有人哭的, 没有人喊的。每一个人的脸铁青, 什么叫恐怖? 每个人的脸铁青, 不敢笑, 也没人哭, 谁都不吭声, 看到谁, 熟人, 只是看一眼, 碰到当官的, 连眼光都不敢相对。还有一种是会意的, 外人看不出来的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们这几个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我同学问我, 你今天身上还有钱吗? 我说, 我身上还有七块钱, 那时候28块钱一个月。说, 吃饭去! 那心里快活, 毛泽东死, 我们心里快活。我们就走到芜湖当时最高级的饭店, 叫同庆楼, 我们走上楼去, 我傻了, 已经全部坐满, 只剩下拐角上的一个小桌子。那是四点多钟, 没有一个人讲话, 没有一阵哭声, 只听到杯子盘子碰得啪啪啪! 碰杯。我从来不喝酒的人, 我们那天把身上所有钱拿出来, 凑成10块钱, 那天大吃了一顿。

B: 毛泽东知道, 他通过正常的通过党委搞运动的途径, 是不可能斗倒刘少奇的, 所以他才背水一战, 利用自己多年来人民领袖的神秘感, 从下而上, 而不再是从上而下地来发动这场政治运动。他要冲破刘少奇路线上的人, 就是那些各省, 各市, 各厂各公社的党委书记们, 所以他必须发动群众。他要求北京学生大串联。而学生大串联, 是要他们去冲击党政机关, 到全国各地去点火, 去串联, 把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点起来了。大城市往小城市, 小城市再往乡村, 然后把所有的党委全部摧垮。省委书记在一个省统治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般人斗不起来, 可是北京来的红卫兵, 把他从家里抓出来, 挂上牌子, 他一斗了, 下面的副书记, 市长也都斗起来了。象我们这样的, 也可以串联啊, 我们挤火车, 坐轮船, 到处玩, 到哪里吃饭不要钱。这样一来, 在学生当中出现了一大批跟我一样的人, 他根本不想去干革命, 但是串联他串了, 吃饭不要钱的事他干了, 游山玩水的事他干了, 这样一串联, 串了一年多。串联停下来就是武斗, 武斗以后就是上山下乡。

A: 林彪事件到文革结束的五年间, 您的经历和体会是怎样的?

B: 林彪事件后, 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曾经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深夜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整个中

国就是一个大监狱。他说，我知道你人好，你不会出卖我。我们在操场的一边走，不敢走到另一边，另一边是一个土坡，土坡上放着上百具棺材，全是武斗中被斗死的学生。我那天回来以后写了一首诗，叫“1971年的月亮”实际上中国真正的民间文学，地下文学，也就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的，1968年开始下放以后就有了。那样一种情况下，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全国人心极其痛苦，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怕人翻案，又搞了一次“一打三反”，一次枪毙的人不压于66年。全国大概枪毙了两百万。为什么，因为林彪事件以后人心涣散。不仅是老百姓觉醒了，毛泽东的那些干部也觉醒了。晓得我们全部是炮灰。红卫兵帮毛主席闹革命，结果是全部下放农村，我们劳动一天挣八分钱，有的劳动一天，不但没有饭吃，还欠生产队的。所以整个人心涣散，信仰开始崩溃，对毛泽东的迷信开始崩溃。社会出现乱象，刑事犯罪越来越厉害。公开的打砸抢烧杀无时没有，无处没有。一个靠枪毙逮捕，靠挂牌子游行游街维持统治的社会，人心会是光明的吗？到74年，他为了搞周恩来，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又斗了一批人，又打了一批人。这是运动时期，非运动时期，每天几乎没有不枪毙人的。整个文革，应该说是 在一个红色恐怖的阴影下，在它的前期，是赤裸裸的鲜血的恐怖，在它的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更多的是一种信仰崩溃的阴影似的恐怖。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是以一个年轻的，不合作者的形象出现的。尽管我觉醒的层次很低，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害人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它是一场迫害人民的政治革命。这一点在我的内心里面，在哪个夜晚，抱着两个外甥女的那个晚上，我是很清楚的。第二，我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幸运者，我的幸运，来源于别人没有看到的一点——海外，西方学界都认为文革是中共统治中最黑暗的岁月，我要承认的是，那种公开的，疯狂的，残酷的杀戮和迫害，是1949年以后最厉害的。但是，一个数字可以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的28年里面，前17年，文革前的17年，他杀害中国人民六千万。文化大革命，杀死，打伤是两千万。前17年里，凡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都必须被强迫他们自己是反动的，整个思想，心灵，灵魂都是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这部分人获得了解脱和解放。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自己也倒了霉，他们百分之九十五都倒了霉。刘少奇都是反革命，那么，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这些帽子的压力反而减轻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它有一个客观效果，表面上，它的轰轰烈烈的杀人镇压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从肉体到精神，远不如前十七年。而且，它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在全中国，把那么多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因此，它使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度过了1966年的那个残酷的夏天之后，我们的心情，比文革前17年，比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感觉反而还轻松了一点。为什么？举目一望，人人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许许多多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跟我住在同一个牛棚里，跟我一道受批斗，我胆子都比原来大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其实是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前身。它使（对）毛泽东的迷信破产了，它使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跟文革前十七年相比，反而变轻了。所以1979年，邓小平为了收拾人心，进行平反的时候，你发现，平反的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57年反右，什么三反五反，59年反右倾，64年什么四清运动，主要是这些。海外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包括台湾，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共产党作孽最多的一个阶段，其实共产党作孽最多的是前17年。17年，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手段，扭曲了人的心灵。

□ 作者投稿

~~~~~

【史海钩沉】

王力、关锋的垮台

• 卜伟华 •

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来进行的。1967年2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不再活动，原来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也不经常召开了。（1）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作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研究处理。

中央文革碰头会原为中央文革小组例会，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在钓鱼台16楼召开。批判“二月逆流”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起初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共10人。2月25日，经毛泽东同意，补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人员，享有正式成员的一切职权，参加所有的会议和活动。此后不久，又增加萧华为列席人员。（2）1967年7月中旬以后，萧华被打倒。7月底，穆欣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弃，令其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8月以后，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3月，杨成武被打倒。3月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增加黄永胜、温玉成两位成员。这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共12人，不再分正式成员与列席成员，至九大未变。

1967年8月底，毛泽东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两名重要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同后来也被隔离审查的戚本禹，一起被称为“王关戚事件”。

1. “运去英雄不自由”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北京的乱摊子丢给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周恩来的日子很不好过。“伍豪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他的头上，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应付眼前的一切。据说那时邓颖超甚至把装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时，可以随身带走。当时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3）

但是，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被江青等人制服，他忍辱负重，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王力8月7日的讲话出笼后，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他打电话向中央文革查问此事，并将一份印有王力讲话的材料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在一起“谈一谈”。康、王二人未予理睬。（4）中央文革的风头正健，并不把周恩来的提议放在心上。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向他们宣布：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5日凌晨1时，刚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

的杨成武，向他谈了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要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把一份印有王力“八七”讲话的材料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并未答复，在经过一天的考虑后，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26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5）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已经有所注意。1967年3月2日，王力未经批准，就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传达了毛泽东2月28日关于“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的批示。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后，就曾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6）。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公开发表过比较有影响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还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过评论员文章和社论。他们都参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他们写的一些文章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狂妄。用王力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的话来说，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翘得更高了”。他们唯江青的马首是瞻，对于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都不太放在眼里，经常当面顶撞，出言不逊。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怂恿下，他们有时甚至对周恩来也敢采取大不敬的态度。

1967年夏天，北京大学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写了一封信，“勒令”交代1962年重新发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经过。这封信送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这封信上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重新发表《修养》的事情牵涉到康生和陈伯达，陈伯达在此信上批了“不同意”三个大字，并对江青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群众团体的“勒令”，不觉得羞耻吗？江青也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她后来在批判王力等人的时候说，王力他们是想要“把两个常委端出去”。鉴于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地位不稳，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曾两次重申了陈伯达作为“一组之长”的地位。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毛泽东曾经欣赏和重用的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

毛泽东对他们实行果断的处置，同时也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沉重一击。9月4日，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信中说：“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9月24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他在中南海听到王海容等人汇报有关情况后，针对王、关、戚问题，援引了晚唐诗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7〕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等人都曾经是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广播电台和各大报刊上，他们在被隔离审查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他们到处发表讲话、演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方面的群众组织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进行表态。在群众眼中，他们都是神通广大的通天人物，经常捧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尚方宝剑对各方面发号施令，狐假虎威，狂妄蛮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的崛起和垮台都很突然，在他们被隔离审查以至被送往监狱关押之后很长时间，正式的宣传媒介对他们从政坛上的突然消失都讳莫如深，不置一词。社会上关于这三个人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不胫而走，但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 北师大“九七事件”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也被批斗。北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曾在红旗杂志社实习过一段时间，早就与林杰过从甚密，曾得到过林杰的不少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说，谭厚兰就是林杰一手扶持起来的造反派头头。她在9月1日晚师大革委会会议上还是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率领师大“井冈山”一部分人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师大革委会、师大“井冈山公社”于9月1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其中还在振振有词地说：“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扼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罪恶活动早已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最近这些家伙又重新抬起了这一法宝，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孤注一掷，大搞政治赌博，继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妄图借此搞垮井冈山红色政权，我井冈山公社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坚决不答应！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

9月3日，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师大“井冈山”成员王东回校向谭厚兰汇报，说林杰确有问题，已经被批斗、被抄家了。谭厚兰听后痛哭失声，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9月2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开会，听北师大“造反兵团”（1967年2月成立，3月解散）的人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井冈山”。

9月6日，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北航开会决定，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成立大会，由“造反兵团”邀请社会上的单位来参加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去人参加大会，由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的刘长信负责调动会场队伍，大会指挥部设在师大对面的电影学院“井冈山总部”，对大会进行遥控。

9月6日，师大革委会成员樊立跃等人发动“政变”，推翻师大革委会，成立“专政委员会”，并对谭厚兰进行抄家和限制自由。9月7日上午，“专政委员会”召开了批斗谭厚兰大会。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的大批人马涌进师大参加了师大“造反兵团”的庆祝大会（8）。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2、3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9）当晚，谢富治派李钟奇去师大，传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1．北师大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组织，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进行检讨。2．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不能搞垮井冈山革命组织，不能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开万人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以上指示由原革委会负责处理执行。”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10）

据康生说，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他在讲话中还说：“要不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11）

中央文革小组当天晚上接见“天派”几个组织的代表，江青骂道：“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当。一定要抓（专政委员会的）三个人。回去要开门整风，北京日报、市革委会也要开门整风……你们一点毛泽东思想都没有，回去好好学习姚文元文章（指《评陶铸的两本书》），好好整风，你们要进行检查。”

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师大“九七事件”作出的反应是迅速的，坚决而有力的。王力、关锋被停职反省后，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恐怕人们对王、关二人的批判会波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和整个小组，一直对此事保密。“九七事件”发生时，“打倒林杰”的大标语已公开在北京街头张贴，如不及时制止，势必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批判王力、关锋等人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愿意看到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为打倒谭震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师大“井冈山”就此垮台，师大“井冈山”的垮台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反击二月逆流”的重新评价。

王、关被审查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荡。在北京造反派中与王、关牵连较多的是“地派”，而“天派”中的一些人则早就开始对王、关有所怀疑。8月31日夜，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几百人冲击光明日报社，与报社部分职工发生武斗。9月1日中午，报社造反派和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将穆欣绑架。周恩来在接到报社职工报告后，责令将穆欣释放。穆欣于9月2日向周恩来写信报告了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总理：

我昨天下午2时被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抓去，今晨5时半已回到报社。昨天下午转了几个地方，最后一个地方是北航。每次转换途中及室内行动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谈话。午夜前后，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谈话，他们提出的主要有这些事：“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问我从小组回报社（12）时谁同我谈的话。

“你是516兵团的后台。”

“你晓得8月30日发生的重大事件么？你从8月29日到9月1日到什么地方开过会？见过什么人？同什么人打过电话？”

“你同红旗杂志什么人联系？你同林杰是什么关系？”……

对这些问题，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们很不满意，对我说了许多威胁的话。谈了10几分钟，便把我送回关押的小屋。

今晨4时左右，他们蒙住我的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门外，急速把车开走。

因为昨天报社有人向您报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关注，特把经过简报如上。感谢党的关怀。

穆欣 9月2日（13）

由此可知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信息是多么的灵通，8月30日王、关被隔离审查，第二天他们就探出了风声。

9月初，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有关王力、关锋的大字报。9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让他们将这类大字报进行覆盖。电话指示说：“这些大字报不要上街，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4）9月17日，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说：“中央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很多事情，你们不应当知道。我们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你们还去乱搞。我们有的事情要封锁到最小的范围。”（15）

注释：

（1）《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30页说：“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这里说的中央碰头会，也称常委碰头会。实际上，中央碰头会并未完全由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59页）5月28日，中央常委碰头会通过了《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第1478页）。7月26日下午在京西宾馆批陈再道的会，也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周恩来年谱》对1967年2月以后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多有记载。

（2）1967年4月21日，萧华、杨成武接见“七一五革命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时，杨成武说：“我们主要在中央文革工作，90%的时间都在中央文革，我们的意见也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32—233页。

（4）《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77页。

（5）《周恩来传》下，第967—968页。

（6）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人曾在一起用“撒仁兴”为笔名合写过文章。

（7）见宗道一：《“王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中华儿女》2002年第1期。宗文还写道，王海容、刘华秋等人写出题为《王八七讲话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报，于9月27日贴出，在外交部引起轰动。此说不确。王海容、刘华秋等九人写的大字报题为《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时间为1967年9月8日。

（8）大会的名称为“打倒林杰，砸烂反动组织516兵团，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

（9）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1967年9月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0〕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写于1967年9—10月）。

〔11〕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2〕穆是8月4日，在与王力、关锋谈话后，回报社“参加运动”的。

〔13〕穆欣：《我在钓鱼台的亲历亲闻》，《中华儿女》1998年第9—10期。

〔14〕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46期，1967年9月10日。

〔15〕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9月17日）。

□ 摘自作者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